

## 调查性报道：题材取向与产制新变化 ——以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例

张玉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进行分析,发现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题材取向多为负面,其故事的主角主要分为有权有势者与弱势群体两类。从调查性报道取得的结果来看,“把权力关进笼子”和“让无力者有力”成为两个最重要的表征。此外,近年来,调查性报道出现产制协作化、内容获取黑客化以及呈现多媒体化等新特点。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调查性报道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关键词:** 调查性报道, 新闻写作, 题材, 特点, 变化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设立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ategory)设立于 1985 年。该奖项设立虽晚,但是,调查性报道这一文体风行美国新闻界却已达百余年之久<sup>①</sup>。调查性报道可以说是新闻报道中的王者——也就是说,它是最难的一种。调查性报道之难,难在其发展历史、题材选择、采制技巧与趋势的认识。此外,在互联网时代,调查性报道的写作还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题材的跨国性、相关信息获取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而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

**作者简介:** 张玉洪(1975.9—),男,重庆人。新闻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生产;媒介与社会发展。

2958-7026 /© Shuangqing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June 7, 2023 Accepted July 12, 2023 Available online July 14, 2023

To cite this paper: 张玉洪 (2023). 调查性报道: 题材取向与产制新变化——以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例. 传播与媒介研究, 第 1 卷, 第 2 期, 10-15.

Doi: <https://doi.org/10.55375/rocm.2023.2.2>

本文从历史扫描与现实关照角度,采用案例分析法和词云分析对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作品进行研究。我们发现获奖的调查性报道作品多为负面信息;故事的主角主要分为有权有势者与弱势群体两类。从调查性报道取得的结果来看,“把权力关进笼子”和“让无力者有力”成为两个最重要的表征。

## 一、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的历史扫描

调查性报道,又称揭丑性报道,专门用来揭露政府机构的丑闻、企业周围的罪恶勾当、黑社会势力的内幕及社会团体的阴暗面等等。常以系列报道的形式陆续发表出来<sup>②</sup>。调查性报道的核心特征有三:一是捍卫公众利益或公民权利,二是揭露黑幕,三是记者独立调查。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称之为调查性报道<sup>③</sup>。

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设立了调查性报道奖。回顾历史,其前身是1953年创设的“无截稿时间的本地报道”(Local Reporting, No Edition Time)。1964年,“地方调查性专业报道奖”(“Local Investigative Specialized Reporting Award)将其取而代之。后者的界定是“颁给一个杰出的当地调查或其他专题报道,最好是由个人或团队产制,以一篇文章或系列报道的形式呈现。着重考虑报道的原创性、睿智、研究性和高质量的写作”。这是普利策新闻奖首次在奖项中提及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sup>④</sup>。1985年,该奖则改为“调查性报道奖”。

值得指出的是,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奖从1918年开始颁奖,其中不少篇目都是调查性报道。比如1921年The Boston Post获奖的系列篇目揭露了骗子Charles Ponzi(查尔斯·庞兹,“庞氏骗局”的始祖)的运作内幕,因此获得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首次颁奖。那时,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奖分为“报道”和“社论”两种。1922年到1923年,获奖篇目虽然来自不同的媒体,却有同样的主题:揭露非法组织的罪行。这些报道通过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从而让社会更美好,是该奖多年坚持不变的追求。2018年,获奖篇目是揭露了有权有钱的掠夺者的所作所为,包括对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制片人之一的指控,从而引发了全世界对女性性虐待的抗议(#METOO运动)。2019年,获奖篇目是揭露学校和执法人员在佛罗里达校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枪击案发生前后处置不当。

回溯美国新闻史,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调查”一词变得极为流行。《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的部分记者因为调查性报道成为全国的英雄。但是,基于本身的性质,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只能由那些资本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媒介来进行,而它们很少接受这一挑战。然而,调查性新闻事业并非始于1960年代。它是从未真正消亡的黑幕揭发传统的延续。<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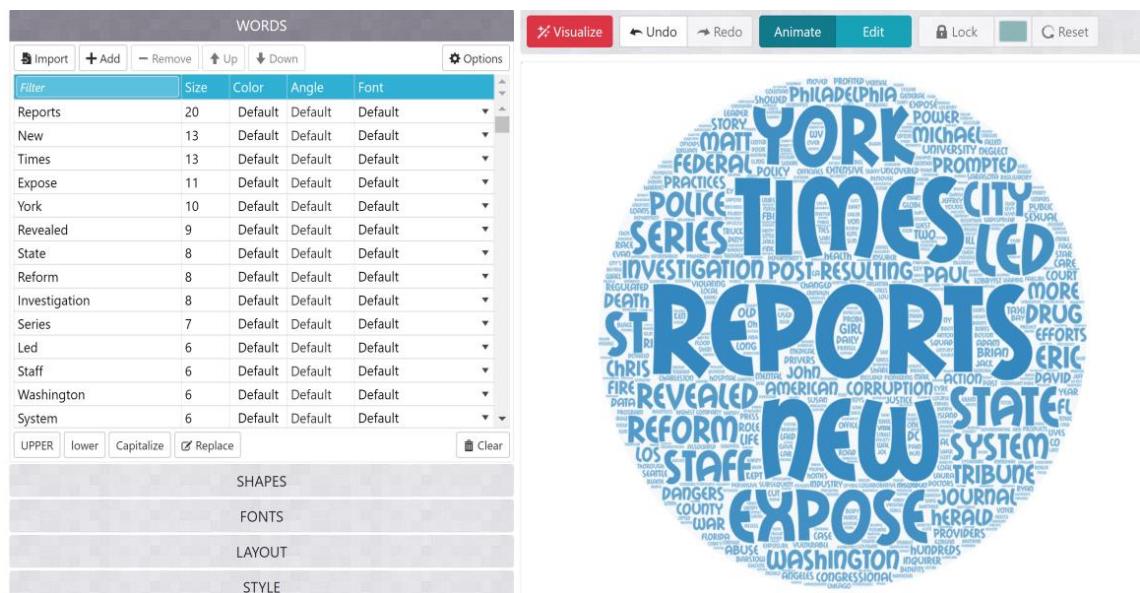
## 二、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的题材选择

值得指出的是,就普利策新闻奖的各种类别来说,“公共服务”与“调查性报道”两类奖项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而“公共服务”本身并不是新闻体裁,而是题材的公共

用性。在历史上，“公共服务”获奖作品中不少是调查性报道，不少参评调查性报道奖项的作品被转为“公共服务”奖项。因此，可以说，“调查性报道”才是普利策新闻奖的重中之重。

基于普利策新闻奖历年“调查性报道”获奖作品(1985-2021)<sup>⑥</sup>，我们可以发现调查性报道的题材特点。我们梳理了历年获奖篇目<sup>⑦</sup>，发现其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题材选择的特质：多为负面信息；故事的主角主要分为有权有势者与弱势群体两类。从调查性报道取得的结果来看，“把权力关进笼子”和“让无力者有力”成为两个最重要的表征。

如果我们将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获奖作品(1985-2021)的颁奖辞文本使用 Wordart 软件进行词云分析，就会得到如下结果：



## 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获奖作品(1985-2021)颁奖辞文本词云分析

从上述词云分析可以看出，《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获奖的频次最高(共 7 次)，*expose*(曝光)出现 11 次，*revealed*(揭露)出现 9 次，*reform*(改革)和*investigation*(调查)各出现 8 次，*corruption*(腐败)出现了 5 次。这也佐证了调查性报道往往是揭开盖子，让见不得阳光的丑闻广为人知。

如果说解释性报道是在解释这个世界，那么，调查性报道将见不得光的黑幕在阳光下显现，促使改变法律、法规或游戏规则，进而改造、改变这个世界，从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正因如此，虽然包括报纸在内的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下举步为艰，美国的调查报道记者 Loretta Tofani 仍然相信，调查性报道仍然可以在报纸版面上茁壮成长，“现在，即使很艰难，记者们依然可以找到很多方法去写调查性报道，发表在报纸上。编辑们喜欢好的故事，而且对社会不公同仇敌忾”<sup>⑧</sup>。

### 三、从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看调查性报道采写的新变化

### 1. 采写工作的协作化

在全球化社会中，很多议题本就是国际化的。“全球议题，本土化操作”渐成常态。这种信息共同分享、协作生产有助于强化议题的影响力。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它由一匿名者于2015年提供给南德意志报。报方将文件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分享，后者动用了全世界来自80个国家与地区，107个媒体组织，以一年的时间整理这些文件，并于2016年4月3日公布初步结果。完整清单已于同年五月初通过专门网站公布。不过，关于“巴拿马文件”的系列报道，获的却是普利策新闻奖解释性报道奖，而且是评委会从国际报道奖入围作品中转过来的。颁奖辞这样写道：“对于‘巴拿马文件’，利用六大洲300多名记者合作发表的一系列报道，揭露了离岸避税天堂隐秘的制度设计和全球规模”<sup>⑨</sup>

与之类似的是“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2017年11月5日，一份被称为“天堂文件”的财务报告遭曝光，揭露了数以百计知名公司和个人的离岸利益。这次爆料是近百家媒体长期调查的结果，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由来自67个国家、90多家媒体的380多名记者组成。英国BBC和《卫报》是这近百家调查媒体团体的成员，他们调查了专业服务公司和离岸公司注册机构的1340万份文件。大部分数据来自一家名为阿普尔比(Appleby)的百慕大群岛海洋产业高端法律服务提供商，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助客户提供低或零税率的海外司法管辖区方面的服务。而这份文件的消息来源并未透露。

## 2. 信息披露(信息来源)的黑客化

在调查性报道中，“线人”(亦称“深喉”)非常重要。“水门事件”报道在1972年见报，并获得197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奖。但当时报道的记者均不到三十岁。他们能拿到内幕消息，全赖一个神秘的线人——代号深喉。

在调查性报道发展史上，很多内幕消息都是内部人士(或知情人士)报料出来的。但近年来有些变化。以“维基解密”为例，一些绝密文件、私人信息是被黑客所获取，然后在网上免费公开。同样，“巴拿马文件”亦类似，巴拿马律所称遭到外部黑客攻击数据泄漏非内部人所为。

## 3. 挑战性越来越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越来越隐蔽；相关信息的量级增强，尤其是对相关数据的抓取、分析和追访难度加大；另外，报道的危险性也在加大。一些记者因为报道一些政要人物的丑闻，导致在所驻国家无法延长签证。

一个典型案例是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获奖作品“Seafood from Slaves”<sup>⑩</sup>(《打鱼奴家》)。美联社三位记者为了调查美国超市和餐馆海鲜的供应链条，调查了数年。该系列报道解放了2000名打鱼奴隶，将犯罪者送上法庭，并促进了渔业改革。

## 4. 呈现方式的多媒体化

在网络媒体时代，调查性报道的写作(或更准确地说，是制作)朝多媒体发展。在内容呈现上，不只是文字，还包括音频、视频和图片(尤其是数据可视化)等多种形式。

在 2015 年普利策新闻奖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小型报纸《信使邮报》(THE POST AND COURIER)凭借调查性报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Till Death Do Us Part)荣膺“公共服务奖”。通过引人入胜的系列报道，作品探讨了为什么南卡罗来纳州是美国女性遇害率最高的州之一，并将促使解决相关问题列入了该州的议程。该报道的网络版本充分运用了融合新闻的报道方式，将文字、图片与受访者视频、交互信息图表和资料链接等融为一体<sup>11</sup>。

### 5. 非营利机构成报道新力量

由于调查性报道周期长、成本高，报纸广告行业近年来遭遇业务断崖式下滑，裁员、减版、转网成为关键词。调查性报道部门和调查记者往往成了最先裁撤和转岗的对象。在中国，两次调研(年份为 2016–2017 与 2010–2011)发现，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减少幅度高达 57.5%(从 306 名降为 130 名)，新媒体机构新增调查记者数量比较有限，整个调查报道行业面临人才流失和队伍萎缩的严峻考验。<sup>12</sup>

美国报业的不景气发生更早。2007–2009 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商业媒体的收入，数万新闻人没了工作，并引发人们对未来品质新闻(Quality journalism)生产的担忧。从那时起，致力于调查调查和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新闻生产机构开始组成、扩大和成熟起来。非营利新闻学院在 2009 年成立时，才 27 个成员，几年后扩大到 160 个。2007–2017 十年里，增长超过 100 个非营利新闻组织。2018 年，在非营利新闻学院外，增加了 110 家左右的非营利新闻组织<sup>13</sup>。

这些非营利新闻组织集结了很多优秀的调查性报道记者，独立或与报纸记者合作的报道多斩获普利策新闻奖在内的多个新闻奖。这些组织中，最大的四家是 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调查性报道中心，1977 年成立，2012 年入围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公共诚信中心，1989 年成立，2014 年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ProPublica(2007 年成立。2010 年，ProPublica 记者 Sheri Fink 和《纽约时报杂志》获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成为首家获得普利策奖的网络传媒。2017 年，ProPublica 与 New York Daily News 获普利策奖公共服务奖)和 Mother Jones(1976 年成立，三获美国国家杂志奖)和 VT Digger(2009 年成立)。

## 四、结论与讨论

调查性报道的采写难度一如掘出冰山下的真实样貌，或剥开现象或事实洋葱的最后一层。当然，正是因为采写难度高，加之题材的特殊性，从而也注定了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力。在揭露与掩盖的角力过程中，传统的工具和方法当然仍然有效，但相关信息的获取难度却越来越大。如果没有内部的吹哨人或黑客，冰山就永远呈现一角，而非全部。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很多题材的跨国性需要多国的调查记者进行合作，实现“国际议题、本土操作”。在作品呈现形式上，调查性报道要适应当下受众的需要，进行多媒体的呈现，甚至进行一些互动游戏设计。

当前，调查性报道对传媒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获得可证实的信息？如何打造专业性的团队和调查记者？在调查性报道的采写中，如何使用众包等方式实现跨地域合作？此外，

与传播伦理有关的争议可能随之而来：相关信息虽然关涉公共利益，但信息的来源却可能不是合法的。这在有的国家就可能触及法律的红线。

## 注 释

- 
- <sup>①</sup>【美】沃尔特·李普曼等(2009). 新闻与正义 III: 14 项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全译本(修订版)[M], 展江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5.
- <sup>②</sup>王蕾编(2000). 外国优秀新闻作品评析,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14.
- <sup>③</sup>王克勤(2011). 调查性报道基本问题梳理. 载赵信编. 法治新闻传播 2011 年第 2 辑[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
- <sup>④</sup>Heinz-D Fischer, J. Erika Fischer(2003). Complete Historical Handbook of the Pulitzer Prize System( 1917–2000), München  
:DE GRUYTER SAUR, p. 118
- <sup>⑤</sup>【美】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2001). 美国新闻史: 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M]. 展江、殷文主译, 新华出版社 2001:494–495.
- <sup>⑥</sup>来源: 普利策新闻奖官网. 来源: <https://www.pulitzer.org/prize-winners-by-category/206> 需要指出的是, 普利策新闻奖“公共利益”(Public Service)获奖的作品中不少都是调查性报道。
- <sup>⑦</sup>来源: 普利策新闻奖官网. 来源: <https://www.pulitzer.org/prize-winners-by-category/206> 需要指出的是, 普利策新闻奖“公共利益”(Public Service)获奖的作品中不少都是调查性报道。
- <sup>⑧</sup>Loretta Tofani (2001).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an Still Thrive at Newspapers, Nieman Reports, Summer.
- <sup>⑨</sup> 普利策新闻奖官网 . 来源 :<Https://www.pulitzer.org/winners/international-consortium-investigative-journalists-mcclatchy-and-miami-herald>
- <sup>⑩</sup>普利策新闻奖官网. 来源: <https://www.pulitzer.org/winners/associated-press>
- <sup>⑪</sup>张培超, 余星馨, 彭兰(2015). 调查性报道的融合新闻呈现——以普利策新闻奖作品《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为例[J]. 新闻界, (21): 42–45.
- <sup>⑫</sup>张志安, 曹艳辉(2017).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J]. 现代传播, 7(11):27–33。
- <sup>⑬</sup>Bill Birnbauer (2019). The Rise of NonProfit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P1–2